

马礼逊《华英字典》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解读与呈现

李 丽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提 要 作为来华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不惜耗时十三载，编纂了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华英字典》。这部字典展示了马礼逊对汉语的认知和中华文化的解读。通过对字典里汉字释义的文化考察，不仅能够明了一位优秀的汉语学习者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掌握和体认，同时该字典广博的文化容量也为汉语的传播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和视角。本文简要介绍了马礼逊的汉语学习经验，重点探讨该字典所呈现出的中华文化的内涵及其编者的解读，包括哲学思想与宗教神话、官僚体系与社会制度；着力梳理其中所涉及的文史经典、世俗民情、时事新闻、俗语警句等，希望不仅能初步彰显这部中西文化“百科全书”的风貌，更能为当今的汉语文化教学、中华文化传播及学习型字典的编纂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马礼逊 《华英字典》 中华文化 汉语

一、引言

汉语全方位、规模化走向世界，既有利于中国融入世界、世界走进中国，也有利于增进中外彼此间的了解，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汉语走向世界需要有学科建设资源的支持，其中工具书资源的建设，其价值和意义甚至比具体教材的建设更为重要，因为工具书的用途更广，规范化程度更高，影响更为深远（李泉，2012）。另一方面，汉语传播历史的研究对于国际汉语教学学科的建设以及汉语学习理念和教学理念的研究至关重要。其中，对西方传教士的汉语学习经历和经验的梳理，对他们编纂的汉语学习的工具书的研究，不仅具有史料价值，亦具有现实意义，正所谓“从世界来看中国”，“从外人来看汉语汉字”（周有光语），从而让我们多一个观察汉语、汉字和中华文化

的视角，多一个来自汉语传播历史经验的借鉴。基于以上考量，本文拟简要介绍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汉语学习的主要方法，重点介绍其所编纂的《华英字典》中对中华文化的解读与呈现，希望能为汉语的教学和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某些参考和借鉴。

二、马礼逊的汉语学习及其启示

马礼逊是英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受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指派来华传教。作为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的先声，1804年伦敦会的董事会特别以书面决议的形式规定了马礼逊前往中国的目标：“一是你可编纂一部中文字典，要超过以前任何这类字典；二是你可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好使世界三分之一的人

口，能够直接阅读中文圣经。”（马礼逊夫人，2004：25～26）因此，虽说是传教士，但掌握中国的语言而非传教，才是马礼逊入华的首要任务。

马礼逊获悉此决议后，便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中文的学习上。在伦敦传教会的帮助下，马礼逊自1805年开始向在伦敦的广东人容三德学习中文（马礼逊夫人，2004：20），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文。据马礼逊回忆，老师要求很严格，采用中国旧式教学方法，重视背诵，殊不知这可能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最好方法。但当时的马礼逊对这种死记硬背的方法极不适应且反感，“有一次老师在纸上写了一段中文要他练习背诵时，马礼逊把那张纸接过来，突然当着老师的面把纸扭作一团，丢进壁炉里烧掉了。这使他的中文老师大为震怒，拒绝再教马礼逊中文达3天之久”（马礼逊夫人，2004：21）。马礼逊在向他的中文老师赔礼道歉和重新学习之后，汉语的写作和认字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高。由此可见，背诵虽说是传统的汉语学习方法，但奏效很快。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马礼逊有了一定的汉语基础。1807年9月，他乘船绕道美国后抵达中国。在澳门登岸后，马礼逊仍把学习中文作为当务之急。他聘请到一位名叫容阿沛的中文老师，正式名字应为容关明（马礼逊夫人，2004：48）。这位来自山西的老师年仅30岁，能说官话，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拉丁语。此外，马礼逊还在一位中国天主教徒“李先生的儿子”的帮助下学习广州话，以适应当地社会。恰巧马礼逊在伦敦时的中文老师容三德也于1807年10月回到广州经商（马礼逊夫人，2004：42～43），这样，马礼逊的中文学习在相对有利的语言环境中得以持续。至于汉语学习材料方面，1807年11月，马礼逊在给伦敦传教会司库哈德凯斯尔牧师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现在从这里买到的《康熙字典》，加进了我从英国带来的《拉丁文—中文字典》中没有的新的中文字。那是只有14册的字典，是过去在欧洲根据老的《康熙字典》编成的。现在我用的由满洲人所编的新的《康

熙字典》，共有32册。用这个办法，我可以学到许多新的中文字。（马礼逊夫人，2004：43）

中文老师们的辅导，手头相关学习工具的参照，再加上传统的教学方法以及沉浸式的学习环境，勉强拼凑并还原了马礼逊单调而略显枯燥的汉语学习历程。

我们可以从以上对马礼逊汉语学习经历的简要介绍中看到，马礼逊曾对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背诵——极为不适应且反感，甚至愤怒到当着老师的面把要求背诵的纸烧掉。对背诵反感的绝不止马礼逊一人，当今的西方人中从孩童到成人“不适应且反感背诵”的都大有人在。然而，背诵这种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至今仍是各类教育、教学的重要方式和方法。尽管所谓死记硬背受到一些人的诟病，但是，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和语文教育主要就是背诵，今天从幼儿园的孩子到中小学生几乎没有不背诵的。汉语、汉字是不是一种更适合背诵学习的语言和文字，这还需要研究，但千百年来一代代中国人都是这样“背诵过来的”，背诵至今仍是儿童习得母语和汉字的基础的、基本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要不要以及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应用到“不适应”乃至“反感”背诵的外国人的汉语学习上，很值得研究和探索。显然，马礼逊汉语学习的成功以及他以背诵为主的学习方法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此外，马礼逊回忆自己的汉语学习过程时强调“老师要求很严格”，这一点也值得当今的国际汉语教学界思考。中国传统教育的观念历来主张严师出高徒，即使对马礼逊这样学习目标明确、学习动机强烈的学习者，也还是严格要求。那么，中国传统的“严格要求”的教育观念在海内外的跨文化汉语教学中要不要坚守，以及如何“严格”，如何与以学生为中心的西方教育观念“对接”，同样值得以汉语为母语的汉语教师认真思考和探索。

三、《华英字典》^①的主要构架与编纂理念

在刻苦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马礼逊从未忘记过其

① 本文所参照版本为：马礼逊著，《华英字典》（影印版），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其中第一卷共三本，第二卷共两本，第三卷共一本。第二、三卷对汉字的释义与第一卷相比要简单许多。第一卷中第一本比第二、三本在汉字释义上更详细，生僻字也更少。本文主要考察第一卷第一本，少量涉及第一卷第二、三本。

辞书编纂的目标和使命。编字典不仅需要具备相当的汉语水平，经济上的支持和资助也是不可或缺的。为了拉赞助，马礼逊四处奔走，耗费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他在1808年5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收到皮尔逊医生从澳门来信，告诉我罗勃茨大班表示愿意资助我的计划，编一本《华英字典》。”（马礼逊夫人，2004：47）有了资金上的保障，马礼逊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旷日持久、工程浩大的《华英字典》的编纂工作之中。《马礼逊回忆录》中对字典的结构、编排及出版等有着较为细致的介绍：

至于《华英字典》，1815年出版了第一卷，书名是《字典》，这是马礼逊根据嘉庆十二年刊刻的《艺文备览》英译的，汉英对照。第二卷第一部在1819年出版，书名是《五车韵府》。第二卷第二部在1820年出版，附录中特别列出了中文的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古文6大类书写方法。第三卷在1822年出版，书名是《英中字典》，内容包括单字、词汇、成语和句型的中英对照，例句都有中文译文。整部《华英字典》在1823年出齐，共有六巨册，合计4595页，工程浩大，全由马礼逊一人经过13年的积累和编纂而成。这部大字典的印制费和技师、刻版工人的工资等项，全部由东印度公司支出，一共高达12000英镑……（马礼逊夫人，2004：100）

《华英字典》的三卷或者说三个部分其实是相互独立的，编写体例亦各不相同。第一卷根据《艺文备览》将汉字笔画分为214个字根来编排（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形成部首查字的汉英字典，书后附有字母索引，其在整个《华英字典》中所占篇幅最大，约为其总页数的五分之三。该字典的部首查字法是中国传统的辞书编纂法，而字母索引则是马礼逊的独创，体现了学习型字典的特点，大大方便了汉语学习者对该字典的使用。

尤其值得关注和借鉴的是马礼逊的字典编纂理念。在编纂第一卷时，马礼逊就有着强烈的文化比较和传播意识。在他看来，中华文化丰富多彩，足资借鉴之

处甚多；过去欧洲只要求商人和传教士学习汉语，这种观点缺乏远见；而且，基督教世界虽已培育出许多具有普遍仁爱思想而又能加以实践之人，但却缺乏专业的学术团体和机构从事文化交流的事业。因此，这部字典所希冀实现的，便不只是向欧洲人宣传和介绍中华文化，更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学习汉语，以便促进文化的交流。不难看出，马礼逊在字典编纂中融入了两个值得借鉴的理念：中外文化比较和中华文化传播；通过对中华文化的介绍来吸引更多的人学习汉语。这样的编纂理念不仅在当时是超前的、先进的，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了在字典中融入中华文化，马礼逊在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广泛涉猎，汲取了大量的中文知识。博览群书是他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手段，如《马礼逊回忆录》记载：“现在我已购买了共有1229册，包括中国的经典作品、天文、地理、律例、历史、宗教、解剖学和中医学等。”（马礼逊夫人，2004：58）马礼逊有意识地进行文化的比较和学习，依据汉字部首进行《华英字典》的排列，便体现出他对中国文献排列方法的借鉴和改进。“这种排列的主要目的是很容易查到需要的字，这是对古代体系的一个改进，尽管被认为不比《六书》《说文》和《玉篇》更达观。”（谭树林，2004：58）从整体框架来看，《华英字典》似是《康熙字典》的翻版和英文注释，但其编译和注解不仅基于《康熙字典》所引的“四书五经”等经典中的例句，更有对大量其他中国文献的参考和借用。其释义详尽、全面，广泛触及了中华文化的诸多层面，已远远超出解释文字本义的范围。

字典的第二卷《五车韵府》为按汉字音序查字法排列的汉英字典（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LPHABETICALLY），依照汉字音标来用英文字母排列。附录中的各种中文书写体使中英文字的比较又有所深化。这一卷的基本结构也是以已有中国著作作为底本，这一底本为清朝一位陈先生的遗稿，在其学生补充、加注后，曾为《康熙字典》的编纂提供过有力的帮助。马礼逊找到这部著作后，即对之加

工、调整、编辑、翻译，由此构成《五车韵府》的主体。此外，马礼逊在编纂《五车韵府》时，还参考了《康熙字典》和罗马天主教士按字母排列编著的《字母字典》(Alphabetic Dictionary)，并进而参阅了《分韵》《佩文韵府》《尔雅》等中国文献(谭树林，2004: 61)，从而使字典在内容和编写方法上都体现出中西文化的对照、比较和沟通。

字典的第三卷《英汉字典》(即《马礼逊回忆录》中的《英中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采用英、汉对照的体例，内容有单词、词组、成语、格言等，其解释和例句还有汉语翻译。虽然在马礼逊之前已有拉丁语与汉语对照的外汉字典，但编纂英汉字典却属马礼逊首创，因而难度颇大。马礼逊自己在序言中亦坦言：“自从作者为本字典搜集词汇，已经过去十三年岁月。在此期间，不断对其增补，但是中文与英文相对应的字全部搜集起来，这样的著作对一个人来说太广泛了。即使穷尽一生，要使它完美也是不可能的。”(谭树林，2004: 63)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华英字典》收录词条四万多，一方面为来华传教士的生活和传教得以顺利开展提供了语言保障；另一方面，其博大厚重的内容也给欧洲学者提供了了解中国语言、政治、历史、制度、习俗、哲学等各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其内容包罗万象，将其誉为中西文化的百科全书亦不为过。

四、《华英字典》汉字释义的文化考察

语言与思想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一个民族的文化、思维习惯乃至整个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往往表现在其语言形式中。在欧美本土，对汉语的学习和研究也是与汉学研究同步发展的。直到今天，欧美许多大学的汉语教学项目还是设立在汉学系或东亚系，而不是设在外语系。因此西方人的汉语学习从一开始就

是与对中华文化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张西平，2005: 218)。如果说这种汉语学习与文化研究紧密联系的习得方式是一种传统，那么这一传统的肇端就不得不追溯到马礼逊这里，从他所编纂的《华英字典》里，我们自可窥得一斑。纵观《华英字典》博大纷杂的文化释义，我们可粗略梳理为以下几类。

4.1 宗教神话、哲学思想

宗教和哲学价值观念向来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和代表一个国家与民族思想内核的文化组成部分。作为传教士的马礼逊，一直非常关注中国人的哲学思维，而土生土长的中国哲学和宗教自当首推道家哲学和道教思想。在对字典第一个字根“一”的解释中(第11页)，马礼逊便引用了《道德经》里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为例句，他还附带介绍了道教“三清”、创始人以及福禄寿三吉神等(第15页)。

道教根植于中华文化土壤，但更主流、更为国人接受的宗教莫过于佛教。在第92页“人”字部“佛”字下，字典便详细介绍了佛陀、阿弥陀佛、三宝、三教、三门、三法、佛法无边等概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马礼逊并没有对其中任何概念和思想进行点评或指摘，如在第405页“口”字部“善”字下，还引用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还不报，时辰未到”^①“善恶到头终有报，高飞远走也难逃”等佛教善恶轮回观。由此不难看出马礼逊较为客观公允的编纂立场。

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传统观念中，“儒”的宗教思想，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儒”的哲学思维可谓广泛渗透在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习俗中。这体现在如第59页“人”字根下，“人为万物之灵”的自我体认上；第48页“五”字下，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的五伦关系中；第63页“仁”字下，“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的价值标准和判断上；第722页“孝”字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

① 字典对某些引文没有加注标点或者只加了少量标点，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本文补加了部分标点。

敢毁伤，孝之始也”的原则宗旨上；第98页“佻”字下，“八佻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尊卑等级观念里；第100页“来”字下，“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人情交往上；甚至还体现在第95页“佩”字下，“农夫佩耒耜，工匠佩斧，妇人佩针缕”“文士佩剑，武士佩刀”等服饰佩戴的要求上。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其文化长河的源头都少不了神话和传说的出席和参与，中华民族自然也不例外。这些神话传说在时间的淘洗下，有的慢慢淡去，有的逐渐沉淀，有的转变为宗教学说，有的则幻化成文学曲艺。只有知晓了一个民族童年期的神话故事，才能把握和判断这个民族的文化成因和特点。这些神话和传说的印迹也同样烙刻在了字典的很多地方。例如，在第14页“一”字部“七夕”词条下，马礼逊介绍了牛郎织女的故事；在第40页“乙”字部“乳”字下，引用了《白虎通》“文王四乳，是谓至仁”为例；第59页“人”字根下，在对于人类起源的种种假说中，马礼逊梳理并引述了《中国神仙鉴》，指出人类及万物生灵肇始于阴阳互交、五行错综、天地中央、湿热相蒸处所产生的天地之灵气，并化汝于五方的黄老、水精子、赤精子、木公和金母。这为人类起源的多种可能性提供了中国式的神话版本。

4.2 官僚体系、社会制度

在有着几千年封建文明的中国社会，壁垒森严又结构缜密的官僚体制和等级制度自是令人惊叹且印象深刻，《华英字典》在这方面有着相当详尽的介绍。如第805页“官”字的释义，从篇幅上看就占据了整整30个版面。字典先是从中国传统的“天官赐福”说起，介绍了官职、官府、官宦人家，介绍了文官和武官、京官和外官、大官和小官等为官的职责操守。然后便不厌其烦地梳理了自上古伏羲、共工氏、神农、黄帝、少昊始的冠名，到虞夏商周设四辅及三公，从秦及汉初至平帝，孔光由太傅迁太师，到汉东京又废，献帝初董卓任太师及卓诛又废，再到汉末的废丞相，以三公综理众务，三省合班奏事，细述了三公、三师、三少和三孤的官衔演变，以及三省六部制的最终演进、确立。洋洋洒

洒数万字的释义内容包罗了中国官僚体制的设置构架和演变发展，文化含量远远超出了其摹本《康熙字典》。

为了保障社会官僚体制的稳定和统治阶层的利益，刑罚制度自必不可少。中国古代刑罚及其实施手段的缜密和老辣在字典里也有着详尽的展示，像第224页“刀”字部“刑”字下，就记载了中国古代从早期“墨、劓、剕、宫、大辟”到后来“笞、杖、徒、流、死”五刑的内容和历史流变，在涉及具体每个字的解释中，又有着对刑罚过程更进一步的描述。另外在“刺”字下，字典还大致解释了西周时期的“三刺”制度，指出这是中国古代所使用的三级别案件研讨程序：“First, of the higher officers of state; second, of the inferior officers; and third, of the people.”这使人对中国的司法体系，尤其是早期司法制度就具备了相应民主和审慎的特性有了初步的印象和了解。

不过从制度层面看，最能选拔人才、也最令人引以为傲的还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不仅是改变身份、地位和等级的有效法宝，也是国家录用人才最为有效的途径。《华英字典》对这一制度的介绍可谓不遗余力。如在第176页“儿”字部“元”字下，字典罗列了会元、进士、解元、举人、状元等称谓及其含义。在第746页“子”字部“学”字下，甚至有长达80个版面的相关铺叙。对于影响中国逾千年的科举制度，马礼逊可谓浓墨重彩，了然于胸。

4.3 文史经典、世俗小说

在《华英字典》中，处处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文史经典的足迹，无论《易经》《诗经》《书经》《孝经》，还是《礼记》《论语》《孟子》《荀子》，抑或是《左传》《史记》《汉书》《吕氏春秋》，都会在汉字释义中深浅不同地出现。除了被尊奉在庙堂之上的经史子集，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也跃入了马礼逊的眼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学习者的他，在字典第一卷的末页就附上了“读书五戒，惺齐铭记”的警言（第868页），而警言的“第一戒”便是“莫看闲书：俚野词曲、小说淫书，一时贪看，正业荒疏”。然而充满悖论意义的是，这位

开创了数个“第一”的传教士，也是介绍和传播《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小说的“第一人”(王燕，2009)。

有论者统计，《红楼梦》里的“词汇及长句”在《华英字典》第三部《英汉字典》里出现最多。“在所引的215句文本中，有130句都出自红楼人物的对话，这些对话多为纯熟、地道的官话口语，感情充沛、句式丰富。”(王雪娇，2013)不过字典第一部的汉字释义里对小说也做了多处引用，除了在第614页“女”字部释“妙”字时提及了《红楼梦》里的“妙玉”，在第49页“二”字部“井”字下，还引了“黛玉自从经手账房，治得内外井井”；第151页“人”字部“傻”字下，引用了“宝玉不似往常，直是一个傻子似的”；第154页“像”字下，摘录了“雨村下轿，闲步进庙，但见庙内神像，金身脱落”等文句。这些所引词句中，除了“妙玉”一词被指为《红楼梦》(字典译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里的人物外，其他均未标明出处。在第624页“女”字部“姐”字下，甚至将“尤三姐”译为“*yew the third sister*”，“巧姐”译为“*the clever young lady*”，也没有说明出处，可见其前后引用的不规范、不统一。但是尽管如此，这部公认以《康熙字典》为圭臬的字典，在汉字释义中大量增添了《康熙字典》所没有的，尤其是出自小说的词汇和例句，足可见编纂者过人的学术识见与胆魄。

据学者研究，在马礼逊其他相关的著述中，至少有三次提及《三国演义》(王燕，2011)。除此以外，《华英字典》在第128页“人”字部“倚”字下，也出现了“曹操依(倚)^①仗军(兵)威，决不肯和”；第479页“土”字部“在”字下，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第223页“刎”字部“刎”字下，有“(貂蝉)妾宁死不辱，遂掣壁间宝剑欲自刎”等，都是源于《三国演义》的释句。第18页“一”字部“不”字下，还解释了出自《水浒传》的成语“不三不四”，不过未标明出处，而源自《西游记》的“(你)不看僧(金)面看佛面”

也未点明出处。另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大明英烈传》《玉娇梨》《明珠》《好逑传》《英云梦传》《五虎平南》《快心编传奇》等小说都被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引用。

4.4 时事摘录、风俗民情

作为一部字典，其用途主要为语言学习的工具，如果同时再附有一些语言背后的文化因素，也自当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若是再牵连出字典编纂时代的新闻介绍或热点事件，则令人意外了些。《华英字典》里就出现了这样的时事摘录。在第一卷第40页“乙”字部“扶乩”词条下出现了这样一段话：“In 1814, a deposed officer of government was condemned to death, for publishing an answer, which he declared he had received in this way, from Confucius. The purport of the answer was, that the Emperor should depute a Prince to worship at the Tombs of his ancestors, instead of going himself; and, that the title of ‘Emperor’ should be taken from the demi-god 关帝 Kwan te; ideas, which were declared to breathe the most daring impiety. The Government commonly discourages the practice.”^②这种对于当时发生的有时间、有内容、有具体过程的社会事件予以记载的情况在字典中并不多见，笔者通览了整部字典，也仅发现了这一处。从第一卷出版的时间为1815年推算，这一事件应该是马礼逊编纂“扶乩”词条时所发生的。之所以纳入新闻事件，可能是编者觉得对于“乩”字的解释，会让不了解中国传统道教思想及占卜方法的西方人有理解上的困难。故而在简单解释“扶乩”为“to support the Ke; or to make the appeal.”之后，立即引入了对此事件的描述，并且也未说明其与“扶乩”一词的内在联系或相关性。由此可以看出编纂者对于较难词句的释义与把握上的失语和无力。不过字典对于时事的摘录，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我们还原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一大民情就

① 马礼逊在引述时有笔误，括号里为正确引文。下同。

② 大意为：1814年，一位官员被罢黜且被判了死刑，原因是他自称为来自儒家学说的“谬论”。这位官员表示，皇帝应该让皇子代替他去祭祖，且“皇帝”也应该改称半神“关帝”云云。这种言论在当时社会被认为是大不敬的。政府通常不鼓励这种做法。

是“谦逊”，语言上的谦逊便体现在“谦辞”“敬辞”的大量使用上。要想读懂中国人，就得先了解中国人所说的谦逊恭敬的语言，相信马礼逊对此也有深切的体认与感受。例如，在第17页“一”字部“下”字下，他指出“在下”是自谦的说法——“在下之下对上之称”，并说明“陛下”“阁下”“足下”的区别。与谦称自己相对的，是对对方的敬称，比如“内人”是称自己的妻子，而“尊夫人”则是对对方妻子的尊称。再拿风俗来说，“一乡有一乡之俗，一国有一国之俗……所以入国而必问俗也”（第17页），通过谦辞和敬辞能窥得中国世风世俗的冰山一角。明白中国的风俗习惯，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字典在很多汉字释例中，都不失时机地介绍了中国丰富多样的社会民情、风俗习惯乃至律令规矩。例如，在第303页“十”字部“卑”字下，介绍了“右重左卑”“天尊地卑”的传统认知标准；第337页“又”字根下，引唐代柳宗元的诗句“入郡腰常（恒）折，逢人手尽叉”，描述古人见面的行礼方式；作为外国人的马礼逊尤其没忘强调“将酒劝人并非恶意”（第337页）的餐桌文化。

4.5 天文地理、警句妙语

整部《华英字典》除了可以教人识汉字、读中文书，还能在循序渐进的学习中，让外国人了解和掌握中国浩瀚多姿的天文地理，乃至博大精深的医药养生等知识。如在第56页“一”字部“京”字下，字典在释义中介绍了“京都”“京师”，指出“天子所居曰京师”，“京，大也；师，众也”。北京是“目前中国的首都，通常被写作 Peking”，而南京“是原先的首都”。在同一页的“亭”字下，字典还介绍了花园的亭子、八角凉亭，介绍了亭台楼阁的建筑和造型特点。在第512页“土”字部“堂”字下，字典图文并茂、极其详尽地描摹了中国古代帝王所建造的最神圣的建筑物“明堂”的建筑格局及功能效用，并且梳理了传说中“明堂”称谓的历史变革。此外，马礼逊还不忘突出中国民间文化传统，介绍了作为社会联系纽带的“明伦堂”、读书求知的“学堂”、主持正义的“大堂”“左

堂”“右堂”以及“官府坐堂”，自然还宣扬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对于有外国留学生教学经验的人来说，他们常常不难感受到，很多留学生对中国各类警句妙语、俗语俚语抱有十足的兴趣，甚至对于街巷骂架、脏话滥语也愿闻其详，津津乐道。趣味性确是学习和接受第二语言的重要诱因，这在《华英字典》里也有着生动的反映和引述。除了介绍常规字典里大多会摘录的如“朝三暮四”“三五成群”“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命世之才”“牡丹虽好，终须绿叶扶持”等长短不一的成语和典故外，马礼逊自开篇就罗列了诸如“好语似珠穿”“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总之，君子身可小可大，丈夫志能屈能伸”“好事不出门，恶事传（行）千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自古道，父债子还”“冤有头，债有主”等警句俗语。当然，骂人的脏话滥调也没有被马礼逊遗漏，如第188页“八”字下，他还饶有兴趣地介绍了“王八头”“乌龟头”“王八蛋”“王八热的”等中国“国骂”的语义和用法。

五、结语与余言

综观上文，我们认为，马礼逊的汉语学习经验，特别是以背诵为主的学习方法，值得当今海内外的汉语教学在一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加以借鉴。事实上，这种方法也正是中国传统的启蒙教学和语文教育的主要方法。同样，马礼逊一再表示的“老师要求很严格”的教学理念，也值得海内外的汉语教学借鉴。实际上，严格要求、“严师出高徒”本身就是中国教育文化的一个传统。

尤其值得借鉴的是，马礼逊《华英字典》中所呈现出的汉字、汉语和中华文化融为一体的编纂模式和编纂理念，特别是对中华文化的广泛而颇具匠心的融入。将文字、语言和文化融为一体的辞书编纂模式，不仅在当时是一种创新，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汉字、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大门，即使在当今的辞书编纂中仍然堪称一种范式，特别是跟海内外一些学习型字典“就文字说文字”“就语言说语言”的做法相比，就更不难看出

《华英字典》的独特价值。而将汉字跟汉语，特别是跟中华文化联系、结合起来，是马礼逊明确在心的一个编纂理念，意在通过汉字的学习来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来吸引更多的人学习汉语。这不能不说是马礼逊的远见和过人之处。可以说，在学习语言文字的同时学习和了解丰富的中华文化内容，是外向型字典编纂应有的理念。《华英字典》开创了这一编纂模式和理念的先河。

当然，限于时代的局限，《华英字典》的不足和欠缺之处自然也有很多。比如，从整部字典的结构分布和内容分量来看，第一卷释义非常详尽，而第二、三卷基本是汉字，尤其是笔画繁杂的字及其注音和简单的英文释义。这些字绝大部分没有释例，而且越到后面，繁杂、生僻、不常用的字越多。因此字典有虎头蛇尾、头重脚轻之憾。又如，字典里有不少对多音多义字的释义和举例不加区分、笼统归在一起的现象。如第109页“便”字，字典将“不便”“便当”“简便”“顺便”“便宜”“得便”“方便”全部置于一处，这样就显得粗疏杂乱。虽然如此，这部字典的汉字释义在重视并凸显传统中国古籍经典、主流思想文化的同时，也不忘牢牢抓住汉字、语词日常生活活性和学习上的趣味性，这在当时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下还是相当可贵的。

参考文献

- 李 泉. 国际汉语教学辞书编撰新创获——《汉语教与学词典》评介 [J]. 对外汉语研究 (第八期), 2012: 90-95.
- 马礼逊夫人. 马礼逊回忆录 [M]. 顾长声,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谭树林. 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 [M].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4.
- 王雪娇. 从马礼逊《华英字典》看《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早期传播 [J]. 红楼梦学刊, 2013 (4): 309-325.
- 王 燕. 作为海外汉语教材的《红楼梦》——评《红楼梦》在西方的早期传播 [J]. 红楼梦学刊, 2009 (6): 310-315.
- 王 燕. 马礼逊与《三国演义》的早期海外传播 [J]. 中华文化研究, 2011 (4): 206-212.
- 张西平. 传教士汉学研究 [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5.

Robert Morrison's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Its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LI Li

Abstract

As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that came to China, Morrison compiled the first English-Chinese and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hich took him 13 years. This dictionary shows Morrison's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 cultural investigation of the definitions in the dictionary shows a good Chinese learner's mastery and re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extensive cultural capacity of the dictionary also provides more ways and perspectives for the spread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s Morrison's experience of learning Chinese, and focuses 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dictionary and the lexicographer's interpretations, including philosophical ideas, religion and mythology, bureaucratic system and social system,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classics, folklore, news and events, sayings and aphorisms, etc. referred to in the dictionary. This article aims to not only reveal the style of the encyclopedia which embodies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but als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and sprea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mpilation of learner's dictionaries.

Keywords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language

作者简介

李丽,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 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汉语教学。

(责任编辑: 孟雯)